

中共外交史上有位著名的才子，他就是70年代做過外交部長的喬冠華。我與喬冠華沾點親帶點，我的姐姐嫁給了喬冠華的兒子喬宗淮，我算是宗淮的內弟。由於這點特殊的關係，因此當朋友告訴我喬的第二任太太章含之寫了一本有關喬冠華的書時，便找了來看。



章含之與喬冠華的婚姻當初就是北京從高層到民間廣泛流傳的閒談話語。至今看來，喬、章二人的結合稱得上珠聯璧合。章含之是個有才華的女人，尤其是她對喬冠華的感情，深沉真摯。只是，俗語說「金無足赤」，自古至今十全十美的故事從來就沒有。雖然《我與喬冠華》一書給人的印象是主人公的純真與追求，但這並非故事的全部，它還有另外的一面不乏庸俗而不為人知。下面我講的只是那另一面的一部份而已。



(一)

70年代的中國，一個30幾歲的女人選擇了一個有着兩個成年子女的60歲男人作為終身伴侶，這種婚姻的悲劇性質在一開始就已經注定了。喬、章二人違反世俗常規的婚姻遭到了子女的反對。喬冠華的兒子喬宗淮是一個沉着、聰敏並具備知識分子氣質的青年。女兒喬松都是父母的寵兒，單純而任性。父親要娶一個只比宗淮大8歲的後母，這令宗淮兄妹十分尷尬。

很早就具備政治家氣質的喬宗淮知道章含之不是出身於政治圈中，年紀輕輕且個性突出，曾以「章政治上不夠成熟，父親應考慮全面，挑選一個能在政治上幫助並保護父親的配偶」為由表示過反對。這對當時正值熱戀的喬、章二人無疑是火上再添一油。宗淮的做法其實有些愚蠢。女兒松都更是激越而單刀直入：「你對不起我媽媽！」是她送給父親的回答。

長時間的拉鋸戰使雙方都有點失去耐心，最慘的是喬冠華，夾在中間左右為難。當宗淮最終對父親表示只得接受父親的決定，接納章含之而試着與她相處時，章含之已失去可能與喬的子女和平共處的信心。父親給他的回答是：喬、章的結合只能是兩人世界。子女必須搬出。

這方面有一個在70年代的中國無法解決的難題，子女搬出，搬到何處？試想那是多事之秋，1973年，中國大陸有哪個人能輕易找到一間可以棲身的房屋？租一間？沒可能。循例向單位去要？至少等幾年，憑藉工齡、貢獻、級別而有幸分到房子的人們把搬家當成天大的事去處理。

宗淮兄妹都受到過外交部運動的牽連而下放到農村去勞動鍛煉，剛剛調回北京不久，他們決沒有工齡貢獻之類的優勢，父親的決定使宗淮十分迷茫。他問：「爸爸，您的意思是……要我們搬到哪兒去呢？」喬冠華的回答具現代意識：「我年輕時很早就出家獨立，我自己離開父母外出闖世界的時候比你現在要小得多啦。」

緊跟着的一件事逼使宗淮兄妹不得不被迫倉促搬遷。一天，松都下班回家，掏出鑰匙開門，插入鎖孔卻久久不能轉動……她驚訝地發現門鎖已被換過了！她不知所措地默立門外，直到老保姆梅阿姨買菜回來，為她開了門，無奈地支吾：「松都，是喬部長……唉……」事實十分清楚，父親已破釜沉舟，新的家庭是一把利劍，要將已失去母親的舊家庭斬斷情緣，被隔離在換了新鎖的大門以外的成員是：兒子喬宗淮、女兒喬松都、兒媳也就是我的大姐彭燕燕，還有她懷孕8個月還未出世的兒子、我的小外甥喬小澎。

迫在眉睫的情勢，使得子女們在最短時間內想出解決辦法：松都必須搬入她當戰士的北京262醫院集體宿舍去。哥哥宗淮已有家庭，不可能去住集體宿舍。於是軍人出身的生性爽直的我大姐提出搬到我家去，但父親的絕情傷盡了子女的心，宗淮決定搬家而不必通知父親。

1973年9月底的一天，是中共第十次黨代會召開的前夕，忙碌的喬冠華不在家，宗淮、我大姐，還有一位宗淮和我兄姐共同的朋友、北京電影學院學生王立行，三人乘坐一輛卡車回到北京報房衛衛的外交部宿舍準備搬家，車子的提供者也是宗淮的朋友，當時的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兼第四機械工業部部長王錚的兒子王蘇民。

嗚嗚當當的搬家舉動惹來了外交部宿舍

查理彭談喬冠華往事

漢嘉女

一大群人駐足圍觀，兩個男丁和一個孕婦從屋子裡吃力地搬動物品，人們只是看卻不幫忙。後來當時駐日大使韓克華的兒子韓燕生走出人群幫一把手，再後來駐捷克大使曹瑛的兒子曹吉東也幫了忙。

大約一小時後，裝得挺滿的中型解放牌卡車呼嘯着絕塵而去，車上裝載着我姐姐姐夫的小家當：一張木製雙人床及被褥，一套桌椅，宗淮的一個箱子，松都的兩個箱子和姐姐結婚時作為陪嫁的四個箱子，外加屬於他們去世的母親龔澎女士的兩個箱子。

還有一個紅木雙門玻璃櫃，那是在宗淮結婚時外交部駐緬甸大使姚仲明作為禮物送給宗淮的，哦，還有宗淮和我大姐賭氣拿走父親的一打唱片，但頂多是二三十張之多並非像章含之書中所說的500張。章含之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釗的養女，曾擔任毛澤東的英文教師，中國著名外交家。1935年生於上海，2008年1月26日上午8時20分在北京朝陽醫院病逝，終年73歲，她的女兒洪晃陪伴她走過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有一件東西沒能搬到車上去，而這造成了松都一生不能擺脫的痛苦，那是在她幼年時母親送給女兒的一架淺色鋼琴，很快在她父親結婚搬出外交部宿舍時這架鋼琴不知下落，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喬冠華遺棄了這件屬於他們私人物品的妻子的遺物。直到多年後，松都再見到父親時仍含着淚水直斥：「我最不能原諒的就是你弄丟了媽媽送給我的鋼琴！」

卡車上的物件除了松都的箱子外全部運到了我家。那時我家情況並不好，母親帶着除大姐二姐外的3個孩子住在父親留下的位於北京北海後門的一座小小四合院里。父親死後，靠母親一人的工資支撐一家的生活，記得那時我們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交房租了。

然而姐夫一家人仍然受到母親展開雙臂的擁抱和我們全體兄弟姊妹的歡迎，宗淮曾對母親說：「媽媽，如果不是您收留我，我會像街上的一條流浪狗一樣走投無路。」

而這次相當魯莽的搬遷顯然使喬冠華及章含之怒火中燒，因為很快，當時的公安部長李震的兒子知會我家：喬部長的夫人（其時章還未嫁入喬家）打電話找到他父親，稱：在黨的「十大」期間，外交部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喬部長家被盜，所有東西洗劫一空。

犯首是喬宗淮，要求公安部立即拘捕喬宗淮。記得宗淮十分緊張，而我母親，平時十分和悅樂觀的一個人，突然間把手向桌上「啪」地一拍，操着她的湖南口音大聲說：「他敢！公安部不是他喬冠華家開的！」當時我被母親的舉動嚇了一跳，從沒見過她發那麼大的火。

緊接着，松都也遭到報復。松都那時已通過天津醫學院的人學考試，正在準備從北京軍區262醫院升入大學。

而在此時北京軍區司令部值班室接到了一個電話，電話記錄上這樣寫着：外交部喬部長家一位婦女來電，轉達喬部長對女兒上學一事的意思，要求軍區領導改變喬松都升大學的決定，希望喬松都繼續留在基層鍛煉。北京軍



區領導的意見是尊重基層的原有決定，這個電話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之所以我們得知了這個電話的內容，是因為當時北京軍區副政委陳正湘中將恰巧是我二姐的公公。

從那時起，宗淮一家在我母親的小院裡度過了幽幽七個年頭。

光陰似水，22年悄然流過，從1982年出國至今，身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元老後代的我竟然變成了美國公民，有時自己也覺莫名其妙。不過自認見過一些世面，決非持僵化觀念之輩。想當年的喬、章之戀，其實是天之使然，俗話說命里注定，而當時所發生的一切，根本無法辨其誰是誰非。我寫這篇文章，並非要埋怨任何人，也不想澄清什麼事，只是有一種想述說往事的沖動，而我所說的這些內容在章含之的書中未見記載。

我以為，喬、章二人有權提出婚後必是「二人世界」的條件。

喬冠華有權將子女驅出門外。喬宗淮有權回家將屬於自己的物品搬走。

喬、章二人有權只顧自己而漠視子女的存

在。章含之有權按照自己的感受和角度去寫回憶丈夫的文章。

而我，也有權將我想說的往事敘述成文。就讓熟悉這些人物的讀者們從這些事件的回憶中去尋找各自的體會與心得吧。

(二)

喬冠華，那時候我是叫他喬叔叔的。在人們的記憶中，喬冠華的奕奕神采、瀟灑碩長的風度是最深刻的印象。從1970年左右我的大姐變成了他的兒媳，這前後我曾有機會見到喬叔叔很多次。但真正構成我寫這篇喬冠華印象的，卻為數僅有4次。第一次，是在1970年的初春時節，那一天，浙浙瀝瀝下着濛濛細雨。

那時，喬家唯一的兒子喬宗淮正值中國大陸許多年輕人都面臨的一個關鍵時刻：畢業後的出路何在？宗淮當時是北京清華大學數力系學生。身為副部長的喬冠華一面要主持外交部的日常工作，同時在部里還要接受批判；「文革」初期的極左派們批判以陳毅為代表的外交路線餘波未平，那段時期大概整個中國百分之九十的人日子都不好過，喬冠華也不例外。

由於父親是受批判對象，宗淮的前途很渺茫。當時宗淮在東北國防工業辦公室所屬的一個農場勞動，而他已得知自己將被分配到外地



工作。記得我大姐心急火燎的打長途電話給家里，那時她也在張家口勞動。

我母親一向視宗淮為親子一般，立刻發動了全家人為她未來女婿的工作出路奔走，終於從過往的記憶中想到了一位父親的老朋友，通過這位叔叔作出多種努力，終於打通了調宗淮回京的關卡。當時國防工辦通知我家急需一份宗淮的簡歷，這件任務落到了只有13歲的我的身上。

當我蹬着自行車穿過初春的雨水來到喬家在北京報房衛衛的外交部宿舍時，渾身已淋得濕漉漉的，喬家的老保姆梅阿姨為我開了門，進入書房時，感覺光線很暗，煙霧繚繞，一只小小的桌式檯燈從一張深紅色的寫字檯上發出幽柔的光芒。

一個人背沖門的方向俯在寫字檯上讀着或寫着什麼，在他頭上方的燈光里，一股股渺渺的煙霧輕盈飄舞着向上翻飛，這孤獨的燈光和屋子裡瀰漫着的薄薄雲霧給我一種不真實的虛幻感覺。我試着叫了聲：「喬叔叔？」那人轉過頭來，立刻，是那個熟悉的富有生命力的嗓音：「哦！是細毛來啦！」（細毛是我的小名）他站起身走向我，是那個闊步向前的一貫姿態，書房的光影里，一個瘦長的影子順着牆壁延伸。

我那時是個唇紅齒白的小男孩兒，喬叔叔一向對我很慈愛，每次見到他都會為我拿糖果，和我說幾句話，這一次也不例外。我簡短地把來意講了，他十分欣喜，把他的妻子龔澎阿姨也叫了出來。龔澎阿姨是個風度幽雅姿態文靜的女人，她和喬叔叔有個共同的習慣：「嗜煙」。

當她從里屋走來時，和喬叔叔一樣手里夾着一支煙，只是她拿煙的姿態是手指緊閉，煙夾在指尖部位，而喬叔叔卻是五指張開，煙捲被攔腰夾在指根部分。龔澎阿姨搖頭嘆道：「瞧這孩子衣服都濕了，趕快歇歇，吃點東西。」

我說不行，材料必須儘快送到國防工辦，我得馬上走。喬叔叔這時將我的頭按入懷中，在我的前額處親了一下，說：「真好孩子。」之後他拿來資料並送我走出房門，那虛幻的煙霧從始至終

纏繞着他，隨着他步子的向前移動，那個瘦長的影子便從牆壁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去了。

再一次見到喬冠華是幾個月之後。那是喬家歷史上一個不幸的時期，龔澎阿姨腦溢血病發後陷入深昏迷，終日躺在北京醫院。那天，我和大姐一起前往醫院去探望一向尊敬的龔澎阿姨，在病房門口遇到了推門而出的喬冠華，喬叔叔的狀態和以往大有不同，他背脊微駝，臉色已沒有往日的光彩，平日喜歡大笑的嘴巴緊閉，醫院里不能抽煙，他周身失去了繚繞的雲煙，因而使他的存在顯得真實。

當我低聲喊他「喬叔叔」時，他抬起頭來，我一下攝到他深色的秀琅眼鏡後面泛着淚光。我開始抽泣，用手掌要抹眼睛，卻被他一把攔向胸口，另一只手撫摸一下我的頭髮，之後又在我前額上親了一下，喃喃說道：「好孩子。」他抬腿走了，緩慢，失重，欠缺一貫的敏捷與自如。我望着那瘦長的背影，感覺到我所熟悉的風度中有什么東西消失了，是隨着龔澎阿姨的離去而消失的……

一晃就是9年之後。多難的中國穿過雨雪，踏過泥濘，是1979年的初夏了。喬冠華第一次肺癆手術後出院不久，我去他北京史家衛衛的居所探望，是和我二哥一起去的。那時我已是22歲的青年，9年中經歷過參軍、復員、工作、學習，已非昔日的小兒童。而喬叔叔自失去龔澎阿姨之後，又已建立了新的家庭。史家衛衛的居所是一個三進的四合院，花草樹木，鬱鬱蔥蔥，舒適清幽，養病是絕好的地方。

進入北屋時，見喬叔叔坐在一個寬背沙發里面，我首先感覺到他的頭髮已有灰白，消瘦是當然的，雙肩陷在沙發靠背里，衣着卻依然規整，他看到我們進來時，似乎眼前一亮：「呵！小毛，細毛，長這麼大了！」當我們向他問候時忽聽得他長嘆了一聲：「唉……你喬叔叔……犯錯誤啦。」我心中暗吃一驚，見過他揮着手高談闊論，見過他擰着眉毛髮脾氣，見過他面無表情擺架子，見過他手執香煙朗聲大笑，可就是沒見過他搖頭嘆息。這時他的第二任太太章含之端着兩杯冰淇淋蘇打水走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喬太太。章含之正當盛年，一頭厚厚的黑髮，笑意盎然，她的體態苗條而不乏豐滿，給人玉樹臨風之感，我們從她手中接過飲料，大家坐下閒談。誰知我二哥與章含之之間爆發了一場極不愉快的爭執，使和諧的氣氛為之改變，話題似乎是從喬叔叔的女兒松都身上談起的。

喬、章的婚姻造成了喬與子女的分離，這是當時人人皆知的事情。1973年之後的喬冠華似乎異常忙碌，他很少和子女聯繫。松都曾因淋巴腺腫瘤作切除手術，一個人孤伶伶地躺在醫院時，父親竟從未去看望過她，想到昔日松都在家中被父母嬌寵的情形，每個人都覺於心不忍，記得個性剛直而絕不圓滑的二哥說：「如果沒有你，松都會失去父愛嗎？你們想到過她的情形有多可憐嗎！」

章含之試圖解釋她對喬家子女從無惡意並十分關心，這之間誤會太多，而二哥不想聽她的解釋，最後章含之淚流滿面，而喬叔叔在一旁長吁短嘆，我趕緊拉着二哥知趣地撤退，我沒有強行去阻止二哥的責難，因為內心深處我有着和他同樣的感受。

回去的路上，我們默默無語，我沒有心思再說話，腦際里充滿了喬叔叔的嘆息之聲。最後一次見到喬冠華，是1982年初我赴美留學的前夕。喬冠華已是第二次住院治療癌症，我自知這次離國或許為時很長，不知何時能再見到喬叔叔了，便去探望他。

這一次，喬叔叔是躺在病床上和我談話了，重病中的喬冠華精神已不復從前，他的手臂吊着點滴，章含之在一旁照顧他。進入他的單人病房，只覺一片白色襲人，白牆壁，白屋頂，白被單。加上喬叔叔蒼白的臉，這無處不在的白色將世間的一切隔絕在病房之外，繁雜的熙攘換來了潔白的寧靜，使我意識到一種反璞歸真的意義。

當他得知我即將遠赴美國時，用一種不再有力卻是柔和的嗓音緩緩敘述起當年他赴日本及德國留學的往事。我注意到他的目光有些迷惘，思緒彷彿走得很遠，聲音逐漸減弱，似乎是在自言自語，靜穆的病房中，只有他微弱的聲音輕輕回蕩。我忽然想起十幾年前的一个雨夜，那個被煙霧繚繞的渾身充滿虛幻的身影。

我離開了醫院，後來又離開了中國，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喬叔叔，我再也也不可能見到喬叔叔。我早就知道，我心目中的喬叔叔已不復存在了。

來源：海外佚聞

